

20世纪
欧美文论
丛书

符号学与语言哲学

【意】翁贝尔托·埃科 著

王天清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

符号学与语言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
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意】翁贝尔托·埃科 著

王天清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符号学与语言哲学 / (意) 埃科著; 王天清译. 一天
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

ISBN 7-5306-4114-X

I. 符... II. ①埃... ②王... III. ①符号学-研究
②语言哲学-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132198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28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000 册

定价: 19.00 元

总 序

二十世纪是战争、革命此起彼伏的时代,也是科技、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时代的激变给予人们思想意识以巨大震荡,思想意识的震荡又促进了文学艺术和文学理论的千变万化。任何一个世纪没有涌现过如此变化多端的文学流派,任何一个世纪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层出不穷的文学理论。

现在,二十世纪快要走完它的历程,而对于本世纪如此庞杂的文论派别,我们却所知无多。论者往往以此归咎于解放后文化上的“闭关锁国”。这部分地是对的。但平心而论,解放以前,这个领域也很少有人问津;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评价上,解放后可说是盛况空前。受冷落的主要是西方现代文论,这确是一个缺陷。它既令人闭目塞聪,难以知己知彼;又造成逆反心理,使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理论二者之间产生“新”、“旧”颠倒的看法。更何况马克思主义不应固步自封,它必须全面了解、接触全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或加以改造,或与之斗争,才能使自身得到丰富和发展。解放后数十年间。我国

文艺理论之少有突破性的进展,原因之一或在于此。

毋庸置疑,当代的西方文论流派存在着许多消极因素,如宣扬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泛性论等等。而且,诸如从新批评以降的当代许多西方文学理论流派,大都是本世纪初俄苏形式主义的苗裔,一般是偏重形式而忽视内容。不过,它们也未始不能给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以滋养。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如梅林、拉法格、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等,在偏重于社会批评的美学批评中,许多论文虽主要侧重于思想分析,但仍闪耀着艺术分析的光辉。他们的渊博的学识中显然还包括了对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某些有价值东西的吸收与融会。由此来看,西方的一些偏重形式的论著,对我们也不无借鉴作用。当然,这必须经过扬弃,加以消化;而不应囫囵吞枣,全盘接受。

近十年来,我国出版界已开始注意评介当代外国文论著作,这一方面的著作已出版了不少,但在选题上一般还不够全面系统,在译文上也参差不齐。为了给我国文艺界、理论界和教育界提供一份比较系统、比较完善的资料,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精选本世纪以来苏、美、英、法、德、意各国有代表性、有影响、有学术价值的各流派的论著——包括当代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文艺社会学、接受美学、形式主义、新批评、存在主义、现象学、阐释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等的重要论著,翻译出版。总数定为三十种,力求以这有限的数量,反映出本世纪重要国家的文论发展的基本轮廓;在译文上也力求完善,以信、达、雅为努力目标。

编辑这样一套比较系统的当代欧美文论丛书,难度甚大,我

们经验不足,知识有限,虽然得到有关专家和出版社同志多方协助,选题的挂漏和译文的错误仍在所难免。尚希读者和专家不吝指正,以利我们不断改进工作。

本《丛书》为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重点项目,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编辑委员会

前 言

本书由1976年至1980年间为《埃伊那乌迪百科全书》所撰写的关于符号学的五个条目组成。从第一个条目到最后一个条目的完成已经近五年了,而从1976年算起到这篇前言的写作则年头更多了。所以,产生一些思想的变化、论述的深化和新的欲求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本书的各个章节既遵循了原条目的总体结构,又进行了一些调整的原因。特别是第二章和第五章改变了原来的安排,第四章加上了新的段落。但常常是新的段落只深化了原来的论述,而一些较短的改动却变动了总体的视观。全书还参考了自那时以来我发表过的其他著作。

正像从书的目录可推知的那样,本书考察了在符号学的探讨中占主导地位的五个概念,符号、意义、隐喻、象征和代码,并以历史的观点对它们逐一予以再认识,也参照了不久前问世的我的其他著作(《论一般符号学》,1975;《读者会话》,1979)所勾

划出的理论框架——我相信,这并不是无的放矢的。这五个论题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有关语言哲学的任何探讨的中心论题。论题的这种一致性难道还不足以解释书的标题吗?

这种选择也是历史的重新建构之设计的近乎自然的结果,这样的重新建构赋予每个论题以自己的特点。从国际符号学第二次会议(维也纳,1979)以来,我一直坚持从古典作品出发对符号学思想(从西方的符号学思想开始)进行重新认识和重新建构的必要性。正是在这个方向上,我近几年来在教学、讲座、学术会议中做了很多工作,编著了即将出版的《符号学百科词典》中历史条目的大部分,阅读了关于这类论题的数量众多的作品。我越发相信,为更好地理解至今仍在困扰我们的很多问题,需要重新审视一下这种范畴首次出现的背景。目前的情况是:当我们重新浏览这些概念的历史时,肯定会遇到数学、医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者,会遇到修辞学家、占卜家、徽章学家、神秘主义的预言者和视觉艺术的理论家,但更为经常遇到的却是哲学家。我不是说只会遇到语言哲学家——从《克鲁底罗篇》的作者^①直到今天的语言哲学家,而是说会遇到所有那些意识到对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进行思考以明了从伦理学到形而上学的很多问题的基础的哲学家。为了更好地进行这一重新解读,我们应当意识到:过去和现在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无不在以某种方式研究符号学。如果不明白洛克^②在《人类理解论》最后

① 指希腊古代的哲学家柏拉图,《克鲁底罗篇》是柏拉图关于语言的一篇对话。——译者注。(后文中“原注”将标明,“译者注”不再另行标出。)

② 洛克(J. Locke, 1632—1704),英国哲学家。

一章所说的人类的全部认识范围都可化为物理学、伦理学和符号学,那么就无法理解洛克;如果不从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的论述——存在可用不同的方式表述,假如存在不是用(!)语言的各种方式表述的,就不会有关于存在的较好定义——出发,我相信也不可能理解亚里士多德早期的哲学。我们还可以继续引证下去,如关于存在和时间的潜含的(但不是不明白的)符号学。

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我们就不能不为这样的事实所震惊:各种哲学史教科书“删去了”这些符号学,把整个哲学引向符号学的必要性,似乎变成了应该予以消除的威胁,唯其如此才能不打乱传统赋予哲学的系统和形象。在本书第二章我们便可看到中世纪的传统是如何认识同时并遮掩和推拒由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的各种注释必然引出的符号学问题的。

但是,我们无意把任何哲学都导入符号学,而只是要考察一下语言哲学的整个传统。从单纯的正式术语的观点来看,语言哲学不可能变成介于形式逻辑、自然语言逻辑、语义学、句法学和语用学之间的某种思辨,像今天经常发生的那样。从斯多噶主义者到卡西莱尔^①,从中世纪学者到维科^②,从奥古斯丁^③到维特根斯坦^④,语言哲学已经涉及到符号的所有系统,在这种意义上讲,语言哲学已经提出了符号学的基本问题。

① 卡西莱尔(E. Cassirer, 1874—1945),德国犹太哲学家、语言学家。

② 维科(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

③ 奥古斯丁(Agostino, 354—430)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

④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1889—1951)英国语言哲学家,自然语言学派的代表。

二

探询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关系,首先要提出特殊符号学和一般符号学的区别。

特殊符号学是诸符号的一种特殊系统的“语法”。有美国聋哑人手势语的语法,英文的语法和交通信号的语法。

我是在其尽可能广泛的意思上理解“语法”一词的,它应包括句法学、语义学和一系列实用语言的规则。在这种场合,我无意探询某一门人类科学的可能性和其界限,但是我认为,较为成熟的诸特殊符号学是有可能追求到某种科学法规的,它具有预见“媒介”符号的诸行为的能力,包括展示虚假的假设之可能性。很清楚,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种符号组成的极为广阔的领域,在音位系统(它是由相继的结构安排组成,由讲述者根据不明确的权限实施)和标证系统(它通过明确的规约提出,对实施者的权限有着明确的规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同样的区别在自然科学的连续统一体中也是能例举出来的,我们知道,正如斯图亚特·穆勒^①已讲过的那样,物理学具有的能力与气象学具有的能力是多么不同。

我这里讲的是特殊符号学,而不是应用的符号学。后者的区域界线是不确切的,对于它,正像对于结构的文学批评或具有符号学倾向的文学批评所做的那样,我可能谈到一些解释—描述性的实践;但我相信,对它没有必要提出科学性质的问题,特

① 斯图亚特·穆勒(Stuart Mill, 1806—1873),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

别是修辞的说服力,理解本文之目的的功利性,对主体间可控制的特定本文进行论述的能力等等问题。

从1978年以来,在我和E·加洛尼之间出现过一场心平气和的争论(从他的《符号学探索》到由马林·敏库整理的他关于此书的答记者问《意大利的文学符号学》),在这场争论中,他认为我们严格坚持各自的立场。一方面,加洛尼对特殊符号学的各种冒险持怀疑态度,要求其哲学根据;而另一方面,我却冒经验探索的风险,把哲学问题放到以后。鉴此,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对立是细微的。我认为,诸特殊符号学应提出自己的完整的认识论问题,也就是要承认并说出它的隐含的形而上学,比如说,不提出“关联”定义的认识论问题,就不可能在任何系统(或本文)中描绘出“关联”的特征。这对任何科学都是一个共有的问题。我想,如果一项科学研究有时候可以在它的探索中取得长足的进步,而不追寻它的哲学依据,这样说并不是不负责任的。对哲学依据的追寻可以由哲学家提出,或者由对自己的方法进行哲学思考的科学家本人提出,而纯正的哲学研究首先提出各种现象和诸规则的草图,然后其他人再以更严格的方式对其进行整理也是常见之事。

一般符号学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我认为它具有哲学的本性,因而它不研究某种特殊的系统,而是提出一些一般范畴,在这些范畴的基础上,不同的系统得以进行比较。对一般符号学来说,哲学的论述不是不可取的和不是不紧迫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哲学的论述是构成的要素。

在这样的哲学追寻中,该如何前进呢?至少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语言哲学传统地遵从的道路(我不是指今天在美国

很多大学中以语言哲学的名义——虽然这常常是简单而又有益的——关于某种特殊的符号系统的训练,如真实价值的形式语义学):它企图用某种方式推演出诸符号系统,即建构出作为符号动物的人的哲学。

另一条路可能是对符号概念进行具有“考古学”特点的研究。我没有引证福科^①,而只限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的考古学模式。一旦需要确定哲学的一种对象和这种对象的存在,那就要看一看前人对此说了些什么。所有的人都以同一方式谈论这个对象吗?如果不是,那么这种总是众说纷纭的古代知识的对象为什么总是以某种方式作为同一对象而被提出来呢?

如果亚里士多德像某些语言哲学家一样行事,那么问题的答案将是非常简单的。这些哲学家发现(这也是正确的)一个词、一种气象征兆,一种感性经验之意义的讲法是各不相同的,他们便认定,所有这些问题应作为不同的学科分别对待。所以,语言哲学家应尽可能只考虑那些很好组成的句子,而把为什么在一张纸上的一些线条能让人想到兔子的问题留给感觉心理学家。这样做,除专业标准的考虑之外,对避免在学术地位的分配和公共与私人基金划分方面引起的冲突,亦是必要的。

但亚里士多德所做的正好相反。他不但巡视了过去的各种哲学论述,而且还进入到了语言的各种用法的同一要义之中;他发现存在是以各种方式被陈述的。正是为此,他才认为有必要问一问,能否从调节这些差异性的深层一致性的角度来提出问

① 福科(Foucault),法国当代的结构主义者,符号学家。

题。

既然这些深层的一致性不出现在表面,那么哲学家是在哪里找到它的呢?像巴门尼德^①一样,他假装找到了它,事实上却是提出了它。他以统一的观点提出了能对各种不同现象进行论述的相同条件。

还是看看这位哲学家或符号学家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的勇敢行为吧。既然存在是以多种方式被说出的,那么存在到底是什么呢?它正是以多种方式被说出的东西。在重新思考一下这种答案之后,我们便会发现西方的所有思想都是建立在某种任意之上的。但这是多么妙的任意呀!

哲学家能够验证他提出的东西吗?不能,他不能在科学家的意义上验证它。哲学家试图提出某种概念,这种概念能够以整体的方式解答一系列的现象,又容许他人建立起自己的部分解释。哲学家不是发现实质,而是提出实质的概念。今天,科学家发现,用本质—偶然性的辩证法已不能解释他所例举出的各种不同的新的现象了,不能证伪一种科学的假设了,他只能单纯地改变认识论的标准和拒绝一种有影响的形而上学。

三

现在,一般符号学提出的东西可能取决于认识的^②决定或

① 巴门尼德(Parmenide,前六世纪—前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

② “认识的”,原文为 teoretico,一般译为“理论的”;但该词源于希腊文“theōretikos”,有先观后识的意义,故译为认识的。

取决于源本的语言用法的重新解读。使思想进步并不必然地意味着拒绝过去,而是意味着重新审视它:不只为了明白曾被实际说出的东西,而且为了明白曾可能被说出的东西,或者为了在重新解读当时被说出的东西时,至少明白今天(可能只有今天)能被说出的东西。

我相信,用任何符号过程的中心概念,即符号的概念,是应该做到这一点的。

首先要指出,当代符号学似乎正在被面临的某种抉择的痛苦所震撼。其基本的概念是符号还是符号过程?这不是微不足道的区别,这种变迁最终会在“ἔργον”(“作品”)的思想和“ἐνέργεια”(“能量”)的思想之间进行抉择。重读一下本世纪符号学思想产生的历史,我们认为,从日内瓦的结构主义到六十年代,一开始符号学是作为符号的思想显现出其轮廓的;后来这种概念发生了危机、解体了,兴趣转移到了诸本文的生成、它们的解释、解释的来源、创造的冲动和符号过程的快感上。

我们可以立即指出,本书企图越过这种变迁,以回到符号概念的起源上,并通过一系列的事件的讨论(见第一章)来表明这种变迁是如何发生在遥远的后期的。简言之,为了不重复应该在以后说的那些事情,本书要论述的是重新发现符号的原本观念,这种观念不是建立在相等、由代码所确立的固定的相关关系和表达与内容的等值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推论、解释和符号过程的动态之上的。最初的符号并不符合“ $a \equiv b$ ”的模式,而是符合“如果……那么”的模式。为此,皮尔士^①曾说:“符号过程是一

① 皮尔士(C. Peirce, 1839—1914),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符号学家。

种行为或影响,它是或者是涉及到三个主题——符号、它的对象和它的解释者的一种——合作;用某些方式采取配对的行为是不能解释这种相关的影响的”^①。但是,符号过程的这个定义和符号的定义是对立的,如果忘记了皮尔士在这段上下文中谈到符号时;他根本不是把它理解为双翼的实体,而是理解为表达和表现体(representamen)——就对象而言,他不仅指的是动态对象,即符号所指的东西,而且还指直接对象,即符号表达的东西,或它的意义,所以,只有当表达即刻卷入到一种三元关系,并且其中的第三项,解释者,能自动地生成一种新的解释以至于无穷时,符号才被提出。对皮尔士来说,符号不只是替代他物的东西,而且一直只是在某种面貌或能力下存在的东西。事实上,符号总是让我们认识更多一些事物的东西^②。

这就是在什么意义上于本书的各章中是可以找到符号,过去的任何符号学思辨的中心议题的,它与解释的过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在第二章,当我们重新研究希腊—中世纪符号定义的理论变迁时,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找到仍在无情地打击形式语义学和与作为同义词的意义之观念及躲避解释的无穷性的自然语言观念相联系的各种语言哲学的病源的。对此,符号的“平面”概念的摧毁,正像在论象征和隐喻的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不应导致不可控制的可解释性的各种过分的对立,也不应导致解构主

① 参见《皮尔士作品集》5·484;意大利文译本第297页。——原注

② 见《皮尔士作品集》8·332。——原注

义的想法:il n'y a pas de vrai sens d'un texte.^①

四

在这方面,一般符号学(这里,断言它是语言哲学的较成熟的形式,如在卡西莱尔、胡塞尔^②、维特根斯坦著作中的那种形式,是负责的)的根本任务是精心制定出使其能看出唯一一个问题的各种范畴,虽然各种表象让我们看到它的众多的和无法减少的问题。

对近视的语言哲学家(本书提到了一些人,但根据的是以少论多的经济的标准)的一般的异议——云不意味着在同一方式中一词所意味的东西,我们回答说,一般符号学根本不是从两种现象具有相同本性的信念出发的。相反,对这个问题的重新审视会告诉我们,需要从柏拉图到奥古斯丁的好几个世纪人们才敢明确地断言云(在指号的形式下它意味着雨)和这个词(在象征的形式下它意味着它本身的定义)是能被引入到符号的较广泛的范畴中的。问题是要明白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全面接近和部分脱离的不间断的辩证法中又总是存在着再次的远离现象。

说云和雲这个词不同是庸俗的,小孩子也会说出这一点。可是,只要根据语言的某些必不可少的共同用法,或根据几百年来一直坚持的理论上的不断重复,询问一下存在着什么东西能

① 法文,其意为“本文的真正意思是看不出来的”。

② 胡塞尔(E. Husserl, 1859—1938),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

够使它们结成姻亲关系却并不是庸俗的。

本书各章几乎全部是围绕着这个纠缠不休的问题和围绕着这个值得重视的古代的疑点的。尽管从百科全书的概念到解释的标准,较近的符号学的各种类型所提出的范畴的设置似乎也是要回答它的;但在这里,本书要在基本的辩论的同一要点中寻求发现这些概念的必然性和表现出的或多或少的动摇性。

当然,本书并不是要找出截至目前为止仍不清楚的传统的“真理”,而是要建构出我们的答案,这些答案,只有我们今天在其他的被忘却的答案和很多被排除的问题的基础上才可能提出。

一九八四年一月